

谈 壇
文 下

谢 宏 著



漓江出版社

10
357

BE48120

坛下谈文

谢 宏 著

连海出版社



坛下谈文

谢宏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3 1/32 印张9.375 插页3 字数216,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7-0505-0/I·377

定价：3.60元



一九八七年七月于天壇

海雲

坛下谈文

谢 宏

目 录

- 1. 迷失在云雾中的思考**
——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1)
- 2. 心灵深处的裂变**
——读《高原的风》…………… (19)
- 3. 评蒋子龙笔下的铁腕人物**…………… (26)
- 4. 历史潮水中的浮标**
——评《人生》中的高加林…………… (34)
- 5. 伟大的奉献和深情的哺育**
——读军事文学《引而不发》和《干杯，女兵们》…………… (39)
- 6. 此情绵绵无绝期**
——读军事文学《绵亘的红土地》…………… (49)
- 7. 心的呼唤 心的祭奠**
——评电影《残月》…………… (64)
- 8. 《红旗谱》评介**…………… (68)
- 9. 评《水浒》中的宋江形象**…………… (79)

- 10. 覆灭前的哀鸣**
——评梁效《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90)

附录：梁效《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104)
11. 美育散论 ………	(117)
12. 使生活显出亮色	
——读鲁迅《自选集·自序》想到的………	(124)
13. 作家艺术家也要提高文化素养 ………	(130)
14. 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的广阔道路	
——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反对两种错误 倾向的斗争………	(135)
15. 让亿万颗精神的太阳冉冉升起	
——谈自由争鸣的层次限度和前景………	(146)
16. 反映论札记	
一、关于文艺“反映生活”说的质疑的质疑…	(152)
二、关于反映的多种含义…	(157)
三、关于“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的不同理解…	(161)
四、创作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	(164)
五、主客体关系中的“社会因素”…	(170)
六、“自我”也是被意识被反映的对象…	(175)
七、关于“感情反映”和“反映感情”…	(179)
八、“表现”论的两个论点及其思想实质…	(183)
17. 评所谓“黑八论”	
一、关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	(191)
二、关于“写真实”论…	(204)
三、关于“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 论…	(224)
四、关于“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 和“反题材决定”论…	(233)
五、关于“时代精神汇合”论…	(240)

18. 评所谓“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任务” (247)
19. “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剖析 (263)
- 后记 (290)

迷失在云雾中的思考

——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引起的轰动和争议，似乎就要过去了。其实，这还是一场比较拘谨的讨论。在某些问题的讨论中，确实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些重要问题，显然是被有意避开或疏漏了。

一

围绕着男主人公性功能的失而复得所展开的如云似雾的两性关系的描写，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为畅销书。但是，诸多读者却在两性关系的描写之外愣住了。人们发现，这不是一般的言情小说，写“性”并非最终目的，而是在于通过主人公性功能的丧失，写人的被阉割。女主人公黄香久这一形象，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小说结尾写章永璘走过荒芜的旷野、沙化的田园时，想起了结婚不久又即将离异的妻子。他深情地感叹道，“我的旷野，我的硝碱地，我的沙化了的田园，我即将和你告别了！你也和她一样，曾经被人摧残，被人蹂躏，但又曾

经脱得精光，心甘情愿地躺在别人下面；你曾经对我不贞，曾经把我欺骗过把我折磨过；你是一片干竭的沼泽，我把多少汗水洒在你上面都留不下痕迹。你是这样的丑陋，恶劣，但又美丽得近乎神奇；我诅咒你，但我又爱你；你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你吸干了我的汗水，我的泪水，也吸干了我的爱情，从而，你也就化作了我的精灵”。在这里，黄香久又似乎成了那片被荒芜了的国土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说，简单地将其作为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进行褒贬，难免不得要领。

二

全篇有两处象征意味极浓的描写。一处是章永璘发现性功能丧失后与大青马的对话；一处是发现妻子不贞后与“马克思”等人的对话。这两次对话都是章永璘自身思想活动、思想斗争的反映，又都是从现实到象征的转换。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作者的思想脉络。

章永璘新婚之夜发现性功能丧失后，便陷入苦闷和羞辱之中。他的坐骑——那只被骗的大青马对他说，他虽然肉体上未遭残害，心理上却受到损伤，实际上被阉割了。大青马认为，章永璘的悲剧在于，被阉割又没有阉割干净，就象大青马的一个“兄弟”，“没有被人骟净，能力丧失了，欲望却还存在，最后被他自身的欲望折磨得发了疯”。

大青马所说的这种被骗又没有被骗净，有欲望又丧失了性功能的状况，正是作者要突出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也是作者塑造人物、展开情节的一个角度。以章永璘为例，由于他还具有

性的欲望、性的“饥渴”——他在幻觉中和上吊自杀的姑娘幽会，甚至常常透过女人的服饰想象到里面滚热的裸体——他终于和丰满美丽的黄香久结婚了，但又因丧失性功能而伤感、羞辱，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纠葛。从章永璘的政治生涯来看，他有信仰，有理想，希望有所作为，但因为被剥夺了施展才能的各种条件，反而历遭磨难。哑巴，则是一个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被阉割又没有阉割净尽的小人物。他忠厚老实，但也爱钱，喜欢过好日子。他出人意外地把拣到的一万元钱交公了，但又出人意外地说了句“有钱才能过好日子”的真心话，这便惹怒了把他树为“先进人物”的领导，以“阶级敌人”的帽子相恫吓，哑巴终于被吓傻。

其实，章永璘周围不只一个哑巴，象哑巴一样被当时的“政治”所阉割又没有阉割干净，像人，又缺乏正常人的思考和灵魂的小人物大有人在。比如，那位专事“提供历史材料”诬陷别人，后又常年为自己申诉永远不得解脱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周瑞成；那位八岁给地主当童养媳，十六岁拒绝贫农团长求婚，五八年被贫农团长打成“地主分子”，至今仍是“逃亡地主”的马老婆子；还有那位要女儿坚信自己是三反分子，彻底跟自己划清界限，被“结合”成领导干部后又坚信“社会主义的财富只能是国营企业生产的，个人生产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农场党委书记；那位每天清晨起来打扫厕所，好不容易脱掉“知识分子”的皮，取得“傻子”称号的水利技术员；还有那位在国难当头、人人自危的时刻，几次在罗宗琪家墙外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快乐的人”。这些人有的握有重权，有的孜孜追求，有的喜形于色，但又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人。

据大青马估计，中国的“整个知识世界都被阉割了”。

“马克思”直言不讳地告诉章永璘：“现在，你们的生产力已经被阉割了，连再生产的能力也没有了，它一直在靠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来勉强维持”。

章永璘谈到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假借旗号自行其事，一种是遵循马克思的教导。“马克思”回答说，前一种人使他面目可憎，后一种人，天真地照他的话亦步亦趋，常常碰壁。这两种人，不管是出于恶意还是善意，都只是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寻找现成的结论，而不是从中提炼方法论。这就是说，在章永璘生活的社会环境里，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被阉割了。章永璘后来所说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也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追寻作者的思路探索了他在所谓性压抑、性心理、性关系描写方面所作的寓意，终于又使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上来。即如前面所说，小说写“性”并非目的，而是通过主人公性功能的丧失，写人的被阉割，知识分子的被阉割，民族生产力的被阉割，马克思主义的被阉割。

三

到此为止，我们的分析还没有越出章永璘的感知范围，我们据以思考和进行判断的生活画面，还都是通过章永璘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而逐步展现出来的。在这样一幅沉重阴郁的生活画卷中，到处都笼罩着章永璘的心灵感觉。要想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就要拂去弥漫在画面上的这层云雾，从章永璘的感知范围里超脱出来，把章永璘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推到我们就要审视的位置上。这就需要首先对章永璘这一艺术形象

进行一番必要的分析与鉴别。

章永璘是一个被严酷的政治风暴卷入社会底层的无辜受害者，一位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是一个智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沦落底层的肉体凡胎。作为一个“肉体凡胎”，章永璘无法挣脱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无法挣脱人所共有的七情六欲在他那个境遇里带给他的种种折磨；作为一个智者，章永璘比他周围那些淳朴但却愚昧、悲惨却又麻木的人物能够更清醒、更敏锐、更准确地传达出底层人民的苦痛。这样，章永璘就成了那个时代痛苦的神经，成了一架被埋在苦难层中，测试社会弊端的“精密仪器”。历史仿佛有意在开一个残酷的玩笑：把一个智者，一个熟读《资本论》，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打入一个非人的环境，使之重新体会肉体的饥饿和性的饥渴，去感受这种低层需求未得满足的熬煎，得到满足时的愉快，得到满足后的烦腻。作者试图通过章永璘这个形象体现出：章永璘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非人的时代。

应该说，章永璘在他生活的那个环境里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他对苦难的感觉和搏击，是有一定典型性的。他在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真实世界与虚伪世界、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尖锐矛盾中所展现的内心冲突，具有真实可信、耐人寻味的一面。

章永璘始终出入在两个互相矛盾着的世界里，一个是真实的世界，一个是虚伪的世界。在有着黄香久、黑子、马老婆子等人的真实世界里，充满着淳朴、真诚、实在，一切都可以感知、可以触摸；而在“无数的废话和谎言”构成的虚伪世界里，则是充溢着冷漠和残酷，人们不敢说真话，只能按照规定的调门去说大话、空话、假话，上头“哄”下边，下边“哄”

上头。在“真实的世界”里，章永璘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他获得了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在“虚伪的世界”里，他失去了自己，成为被奴役、被阉割的对象，“真实的世界”要他苟活，要他安分和麻木，但也使他触到了那种不能被“政治”征服的要过好日子的脉搏。“虚伪的世界”支配着他的生活，决定着他的生死，但也向他暗示了无法再维持下去的转机。不管是真实的世界还是虚伪的世界，都是章永璘注定要冲出、要打破的现实，都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的对立物。

既然现实生活充满了苦难、欺诈和丑恶，那么，让人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就成了一个最普通、最简单的理想。熟读《资本论》的章永璘明确提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理想是清晰的，但是章永璘却注定要在冷酷的现实里苦思和挣扎——这是因为章永璘的命运规定了，他愈是有理想，愈要受迫害，愈是受迫害，便愈觉现实的丑恶。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恶性循环。也正是这一恶性循环使章永璘在看到新的转机时下定了“出走”的决心，他知道，不能摆脱这个环境，便不能改变这个环境。

如果说真实世界与虚伪世界的矛盾是横向矛盾，那么，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矛盾就是纵向矛盾，这种纵横交错的矛盾又都是通过章永璘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的矛盾，也就是灵与肉的矛盾向前推进的。

本来，章永璘鉴于自己的使命和抱负早就提防着被儿女之情所软化，决计要用“硬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但是，作为一个肉体凡胎，一个在个人生活上遭受摧残的人，他又经常抑制不住肉体里的“魔障”在他的脉络中“肆无忌惮地乱窜”；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和黄香久的结合只是肉体的结合，在黄香久的感情天地里，他无法构筑自己的未来，但他只

要和她在一起，就又禁不住玩味和泄泄；在理智上他终于宽容了黄香久的“背弃”，但在感情上却又无法拂去那个阴影……于是，我们便经常可以看到章永璘的两个身影，一个是清醒的充满了政治意识和使命感的章永璘，一个是感性的被原始情欲驱使着的章永璘。理智的章永璘甚至看着动物的章永璘出丑，然后为之忏悔，为之汗颜。章永璘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不仅要在非人的环境里超脱出来，而且要战胜自身的“魔障”向理性超越。在章永璘的感性世界和真实世界里活跃着的黄香久，不幸地成了章永璘理性超越中低层需求的象征。

章与黄的聚合与离异，有着严肃的象征意义，但又交织着活生生的感情纠葛。也就是说，它所揭示的社会主题是渗透在私生活的感情纠葛中向前推进的。如果说章永璘由于性功能的丧失遭受新婚妻子的唾骂和凌辱是整个社会悲剧以具体感性的形式在个人生活中的发作，那么党的支部书记在一个黑夜里从肉体上占有了他的妻子，而又偏偏被章永璘目睹，这就又将个人的悲剧淋漓尽致地推向社会，同时也推向社会的深层意识。正是这个“阴影”，从感性的角度帮助章永璘完成了理性的超越，最终促成了章永璘的“出走”。

章永璘对于当时的政治动荡，他的感觉是敏锐的。他承受着政治的重压，很早就失去了新中国的光照，对于社会阴暗面有着本能的仇恨。因此，对于即将成熟的历史转机，对于这种转机在人们心里激起的风浪，章永璘不能不有着特殊的感受。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和“下台”所造成社会动荡，在章永璘的眼里得到了生动的反映。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给人们带来了希冀，而同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则显示着新的灾难。面对着历史风云，人们终于看清了，不肯顺从了，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作出各自的反应；周瑞成“上山”

了，曹学义看透了，“哑巴开口说话的日子也快到了”。小说的这些描写准确地反映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天安门群众运动前后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

章永璘对于国家和民族遭受极左路线全面摧残和阉割的估计，如果从时间、空间和范围上加以限定，也许会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尽管“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在章永璘的感觉中只有一片遥远的“嗡嗡嗡”的合声，尽管章永璘的全部活动被封闭在边远的村寨中进行，人们还是不能不随着章永璘的感觉，记起那个让人诅咒但又无法超越的时代。——不是吗，我们的国民经济不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吗？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不是被“焚书坑儒”、“思想专政”搞得息声敛气人人自危吗？我们说，对于刚刚过去的那场悲剧应该“从时间、空间和范围上加以限定”，是因为在章永璘的感觉和判断中，这场悲剧是从1957年开始的；悲剧的空间则从监狱、劳改农场一直扩展到全国；悲剧的原因被归咎于二十年来贯穿始终的强大政治力量的有意为之。我们认为，这是章永璘的偏误之处，沿着章永璘的这一偏误我们就会发现作者的某些偏误。

四

1975年夏天，章永璘对他的老友罗宗琪说，“老罗，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太长了，演了十几年。不知道观众是什么感觉，我这个演员是演乏了”。在这里，章永璘用“十几年”说明悲剧的时间；罗宗琪说，“整了你十几年，你还这样天真”。在这里，罗宗琪对“十几年”的重复使用，说明这场悲剧的前限是1957年，因为章永璘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章永璘多次

抨击的“十多年来”、“十几年来”、“近二十年来”存在的黑暗和罪恶，都是发生在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

这二十年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章永璘说，“自从1958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会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

章永璘在谈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投入劳改队时说，“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象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被骟的大青马——章永璘自己的影子说，“我甚至怀疑你们整个知识界都被阉掉了”，“如果你们当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是真正的须眉男子，你们的国家也不会搞成这般模样”。

章永璘说，“这十几年来他们所作的最大努力不是改善人和人的关系，而是切断人与人的横向交往。我甚至认为这是他们造成最大祸患。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善意、人道和义侠气概全部破坏掉了，把人变成了狼和狐狸”；

章永璘说，“这十多年来，他们是宁肯错捕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

章永璘说，“我们被欺负了十几年，被愚弄了十几年，被当作试验品试验了十几年，难道我们在试验失败而致我们于死地的时候连一声疼都喊不出来吗？”

谁有能力切断人们的横向交往，把人变成狼和狐狸？谁有力量捕杀人民？谁能把人民和国家当作试验品？谁有权利制订法律和制度使几亿农民陷入厄运，把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阉割？